

“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理论的意义”

——回忆父亲张岱年及其综合创新论

张尊超

今年正值父亲张岱年逝世10周年，北京大学、清华人文学院、社会科学院和中科大人文学院等单位召开了纪念会，我想这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现在我从家人的角度来谈谈父亲。

父亲一生致力于综合创新，他提出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并一生身体力行。

父亲一生致力于独立思考。事实上，这也是他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就提出综合创新思想的原动力之一。

他十七岁时写的文章道：“先王之法，不惟在后世不可用，在当时亦未必尽当也；……”“不能怀疑，则必不能得真”；“崇拜圣哲学圣哲，非当完全服从圣哲，……他有创造的贡献，我亦要有创造的贡献”，“一个人不可作一古人凭以借尸还魂之人”。

他在1932年的日记中写道：“每每想起西洋现代青年学者日

日努力于学术工作，我又自警，若不快地专心一志于学术，怎能在世界学术界占一席之地呢？终生做他们的传达者，我是不甘心的。”……“我实在不能受任何前人的限制。前人所发现的真理，我可充分吸取；前人所应用而有效的方法，我可尽量采用。我却不能只作前人学说之阐释者或修正者。……哲学的工作，离不开创发。哲学研究之路，是面对实在，不是面对典籍”。



2000年秋张岱年在香山双清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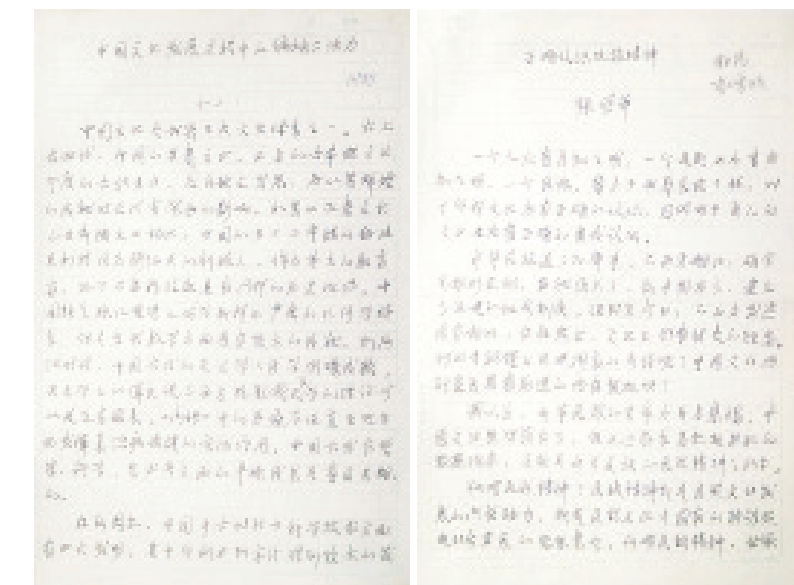
张岱年

（1909~2004年），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1933年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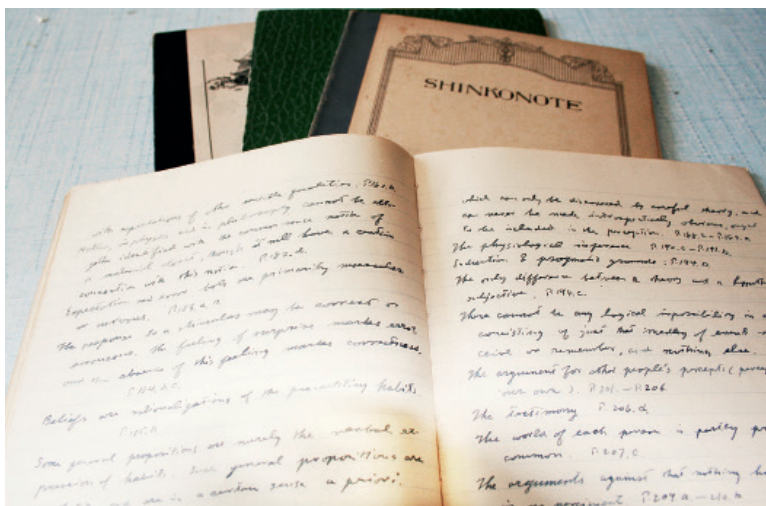
他第一次正式和我谈起他的综合创新思想，大约是1969年末，我从外地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提醒我：要注意有创造，要综合创新。文化的发展要综合创新，哲学的发展也要综合创新。你走到工作岗位上，在工作中也应该注意综合创新。他以一种哲学的宏观思维谈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学无线电的，当时的计算机有好几间房屋大，父亲说，将来计算机发展到可以装进提包里。我说：“你这是天方夜谭。”而如今这个天方夜谭已经成为现实。他还讲了他的综合创新学说理论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理论的意义，但我当时对他的话没有很好地理解。

后来我读父亲的著作，才对父亲的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已提出综合创新，当时说的是“综合创造”。上世纪30年代初，曾经有过一场中国文化论争。有些人坚决主张全盘西化，另外有人坚决主张国粹主义、鼓吹旧文化。而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化综合创造论”。1933~1935年间，他先后写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西化与创造》、《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多篇文章来论述这个问题。

父亲认为，文化走向关系的是民族危亡，“中国人如果



张岱年手稿



30年代起，张岱年阅读了大量西方哲学及科学著作。这是部分读书笔记

守旧不改，则无异于毁灭；如果妄自菲薄，以为百不如人，则难免有被外来侵略者征服的危险”。“惟有信取文化的创造主义而实践之，然后中国民族的文化才能再生，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国民族才能复兴，创造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无疑的，是中国文化之唯一的出路”。

他又特别强调综合：“创造的综合即对旧事物加以‘拔夺’而生成的新事物。一面否定了旧事物，一面又保持旧事物中之好的东西，且不惟保持之，而且提高之，举扬之；同时更有所新创，以新的姿态出现。凡创造的综合……，是否定了旧事物后而出现的新整体。”

“综合应有别于混合或调



1989年5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张岱年先生从事教育和研究56周年暨80寿诞祝贺会。左起：张孝文（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张岱年、羊涤生（清华大学教授）、朱德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和。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他强调必须用辩证的方法来分析文化，主张尽可能地吸收西方文化中优良的东西，而弃其流弊；同时克除中国文化中病态腐蚀的部分，而保持发展其中健康的部分。他强调“固要吸纳西洋文化，却又要避免为西洋所同化”，“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他主张“发扬中国固有的卓越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这虽然是三十年代所写，但即使今天回首，这些话仍极具真知性。

半个世纪以后，在20世纪

80年代和90年代又有过两次文化讨论。我父亲又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

这时候我已经调回北京，他也常和我谈起文化综合创新问题。这时因为大家都很忙，不像上次能用整块的时间和我谈，只是在见面的时候有空聊几句。他对我说，中华民族是有创造性的，一个民族没有创造性，这个民族就完了。关于文化问题，我反对全盘西化论，也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主张兼综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他特别强调，既要弘扬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殊贡献，又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先进的科学成就。而文化的综合创新有

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唯物辩证法。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当说到“全盘西化是断送中国前途的主张，他们根本不懂历史，既不懂中国历史，也不懂世界历史”的时候，父亲非常激动，简直是在呐喊，我妈赶紧来劝他。

后来当综合创新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他由衷地高兴。1999年8月《求是》杂志编辑采访，说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影响

很大，我爸听了非常高兴，说“终于不枉费心力了”。我回到家，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他又提到此事，欣慰之色溢于言表。

父亲总是对我说：“我不是儒家，我信持辩证唯物主义。”应当强调，他这里说的是他从年轻时就提出的“解析的新唯物论”，即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

我想他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渊源，要从他年轻的时候说起。

这里讲个小故事：我高中的时候，政治课讲到辩证唯物主义。因为讲得简单抽象，我听得云里雾里，似懂非懂。回家仔细问父亲，他竟然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我说，你说的这些太多了，能不能写出来让

我慢慢看慢慢消化。父亲仅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手写出一本深入浅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提纲”给我看。我仔细看后，又问他不少问题，他在回答的过程中，旁征博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著作，不用查书，出口成章。有时我问，“恩格斯哪篇文章说的这话？”他脱口而出在哪本书第几页。这让我十分吃惊。我问他，你怎么这么熟啊？简直倒背如流了。我说，我听你平常跟客人谈的都是孔子孟子庄子荀子，你不是在研究中国哲学史吗？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看过包括辩证唯物论在内的大量中外哲学书籍，“你不知道我当时下了多大的功夫”。他看中译本，不满意，就通读原著。他说只有看原著才能真正体会其深层含义。至今家里还保留着他年轻时读的原著，上面写满了批语，划上了重点，还有许多英文写的读书笔记。他看的书真不少，包括罗素、穆尔、怀特海、博若德、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费尔巴哈、维特根斯坦，还读康德、尼采、欧根·斯宾诺莎……而且对每本书都有评论。在一本英文版的辩证唯物论的书的封面，他写道：“真正的真理”。

父亲对唯物辩证法的坚定信念，是建立在对人类思想成果的深入研究之上，更是因为与自己的所思、所得深度契合。对于新唯物论，父亲并不盲从，他说过：“今人对于新唯物论

的态度，可分三种：一是墨守的态度，即类乎宗教信仰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易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二是盲目反对的态度，即不求甚解，不做同情的体察，而悍然作不中肯的驳诘。三是修正的态度，即认宗师所说有对有不对，应有所改变。对于这三种态度，我都不赞成。我的意思认为学术之进，端赖自由思想与批评态度，以水济

水，实非真学。而不求知之即反对之态度，更属狂谬。……我的态度是发挥扩充：对于已有之理论应更加阐发，而以前未及讨论之问题，应补充研讨之。”

我父亲在认识论上强调解析的新唯物论，同时强调理想，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是他的一大特点。

他始终强调“理想”，他说：



张岱年题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2001年搬入蓝旗营新居，张岱年与夫人冯纘兰在客厅合影

“人群是必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作其努力的目标……一个民族，必须有值得为之牺牲的理想，人民更必须有为理想而牺牲的精神，然后这个民族才能强盛。有这种大理想，人们才会觉得人生有意义，才会觉得人生有价值；没有这种大理想，人们会感到空虚、无谓，因而萎废、堕退。这种大理想，是一个健全的民族所必须有，而宣示这种大理想者，当是哲学。”

值得一提的是：哲学对于父亲，从来不是象牙塔中的教条，而是服务于社会、人生的。1934年，他写道：“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必要有一种勇猛刚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1935年，他说：“尤其在中国现在，国家与文化都在存亡绝续之交，人们或失其自信，或甘于萎堕，……在此时，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

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

《中国哲学大纲》就是他在民族危亡时刻“空所依旁探求新哲学之路”的“创发”，是哲学创新精神的实践。他曾说：“当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主要还是对代表人物、学派的分类、分期的叙述性研究，真正旨在清理并重构这个传统哲学体系，特别是以问题和范畴为纲，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著作，似乎还没有。要弥补这项缺憾，成为我撰作此书的最初动机。”这部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揭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体系。

父亲一生著作等身，包括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以及文化问题。他晚年在一个自我介

绍中这样写道：

“我的座右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言有物而行有恒。”

这正恰恰勾勒出他的一生。

父亲从年轻的时候起，就特别强调中华民族精神。他十分热爱《易经》中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85年5月起兼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时，他特别强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和综合创新的理论。

他认为，中华民族屹立世界5000年，必有其民族生存的优秀精神支柱，这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父亲一直在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精神，其实，这也是他一生安身立命的八个字。这不仅成为他研究学问的主旨，更是从少年时候起就成为他日常行为的准则。直到耄耋之年，他还以老迈之躯写文章做讲演，不遗余力地高调倡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他写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还有志于写出一本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专著。1997年6月16日，他开始写作《自然与人》，用辩证的观点重新论述天人关系，可惜最终未能完成。

我想，现在国家正面临中国崛起的机遇和挑战，综合创新的理论，将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无论对现在，还是对将来，特别是将来。📖